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社會網絡、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為例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and Human Capital on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Yunlin County Association of New
Taipei City



陳其育

Chi-Yu Chen

指導教授：辛炳隆 博士

Advisor : Ping-Lung Hsin, Ph. D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July, 201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論文係陳其育君 (P99341020) 在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辛炳隆

(指導教授)

劉念瑛

于若芝

所長：

周繼端

誌 謝

辛炳隆老師，謝謝您。想了很久，覺得這篇謝辭沒有更好的開頭。回顧這一年論作寫作的過程，辛老師您像個經驗老道的船長，在我的思緒陷入濃霧裡時，總能適時的指引方向。有時，您也像個鐵血的教官，我一鬆懈怠緩，您當頭就是棒喝。不過，我們始終知道您有顆如春日溫煦的心，否則我們無法開花結果。

我的同門師兄師姊——榮邦欣、翁燕雪、鄭如惠，你們總不吝惜提供經驗，讓我這位起步較晚的師弟得以跟上步伐。過去這段日子，有幾回為了與老師討論文，冬天的假日清晨也得早起，走在料峭的街頭，想起你們也為了同樣的目標努力著，頓時充滿動力。人生應該很難有如此的機會，一夥人一起完成共同的夢想。還有 99 級同學們，感謝你們讓這段原本苦澀的日子變得甜美。

我更要感謝中華民國雲林同鄉總會張朝國總會長、王崑山前總會長、蔡慶輝秘書長、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林明德總幹事、陳夜束秘書以及新北市雲林同鄉會 11 個分會幹部的協助，您們讓我感受到雲林鄉親的熱情，以及雲林人特有的樸實善良。

一路來給予我最大支持的人是我的妻子劉明芳。這兩年來，妳幾乎一個人承擔起主要的日常事務，是妳讓我能夠心無旁騖的投入工作與學業，感謝妳的包容及付出。

此時，比我更高興的是我的父母。我願把這一刻所具有的價值，全獻給您們。

摘要

城鄉移民是工業化及都市化過程中的顯著現象，國內過去關於此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討造成鄉村人口往城市遷移的原因，以及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後的影響，但對於鄉村人口遷入城市後，是否發生社會流動，以及何以出現不同的社會流動的探討，卻相對稀少。

根據政府的人口遷移資料，雲林縣是我國人口外移最多的縣市之一，該縣的外流人口主要移至新北市，初估約有 40 萬的雲林人旅居新北市。許多先後從雲林縣北上的人成立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形成凝聚鄉親向心力的重要組織。然而，新北市雲林同鄉會的會員們，在歷經多年的遷移生活後，彼此的職業變遷、社會地位出現不同的結果。為何來自相同故鄉的人，後來的社會流動卻彼此不同？本研究將驗證社會網絡、人力資本是否為影響其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根據研究結果，發現「遷移後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及「遷移時的受教育年數」均對「主觀的社會流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促進社會流動有正向的效用。

關鍵字：城鄉移民、社會流動、遷移、社會資本、社會網絡、人力資本、雲林同鄉會

Abstract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s an apparent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t domestic research, mos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a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However, after the migration,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the migration did happen, or what kind of migration it brings.

According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s internal migration data, Yunlin County i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emigration. About 400,000 Yunlin County's residents moved to new Taipei county. The people from the Yunlin county organized the Yunlin Association of New Taipei Cit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se Yunlin Association members. Why the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same hometown are differ within the later social mobility. This study is try to verify either the social network or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main factor behind it.

Keywords: urban-rural migration, social mobility, migrati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human capital, Yunlin Association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3
第三節 研究目的.....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	5
第五節 章節安排.....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社會流動.....	7
第二節 社會網絡與社會流動.....	13
第三節 人力資本與社會流動.....	1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26
第二節 研究假設.....	27
第三節 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27
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31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31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33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33
第二節 迴歸分析.....	3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44
第一節 研究結論.....	44
第二節 研究建議.....	46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46
參考文獻.....	48
附錄.....	53



圖 目 錄

圖 1-1	黃敏星 1961—2008 年台灣地區各產業就業人口之趨勢圖.....1
圖 3-1	研究架構圖.....26



表 目 錄

表 2-3-1	邱惠玲等人人力資本內涵彙整表.....	20
表 2-3-2	邱惠玲等人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與 OECD 比較.....	21
表 4-1	個人屬性.....	34
表 4-2	自變項及依變項之描述分析.....	36
表 4-3	依變項-客觀社會流動.....	42
表 4-4	依變項-主觀社會流動.....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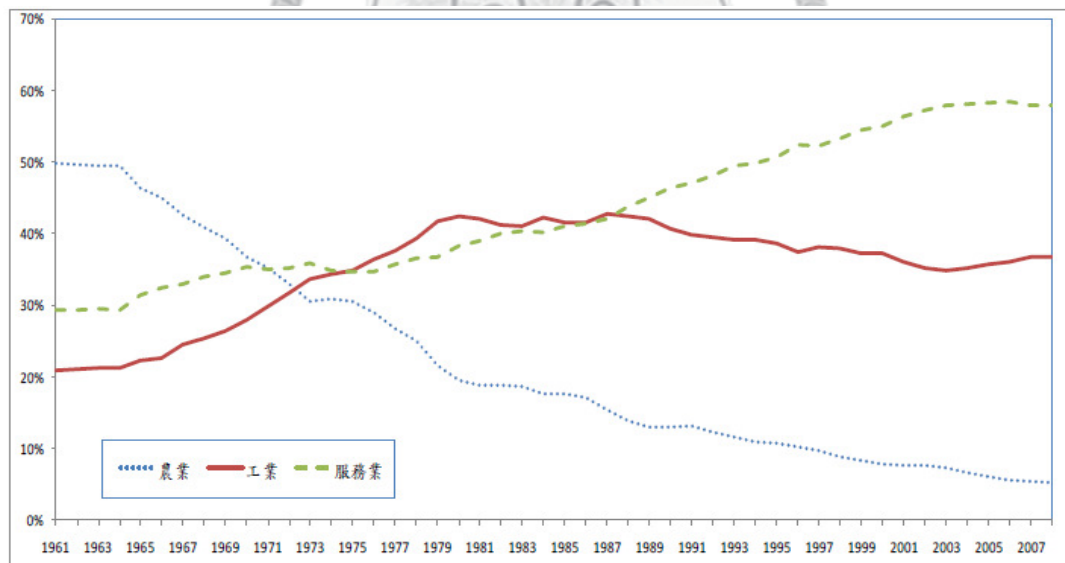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經濟成長成為國際焦點，回首我國產業型態轉變，台灣在短短的六十多年，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接著跨入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此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被視為「發展型國家」¹的典範。

回顧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從黃敏星（2009）的研究可看出國內各級產業就業人口的消長，1960年代初期，台灣的農業人口最多，其次是服務業人口，最後才是工業人口。到了1972年，服務業人口超越農業人口，至1973年，工業人口也超越農業人口，1975年工業人口持續上升，一度超過服務業人口，直至1988年，服務業人口躍升為各級產業之首（圖1-1）。

圖 1-1：1961—2008 年台灣地區各產業就業人口之趨勢圖



資料來源：黃敏星，2003。

在台灣各級產業的就業人口中，農業部門的變化最為顯著。行政院主計總處2010年4月公布的資料顯示，農村就業人口在1978年時有153萬人，平均每4個就業者，就有一人在農村就業，工業化後，農村人口外流，農業就業人數在1993

¹所謂「發展型國家」是以經濟發展為取向，國家有效介入市場引導私部門，並以能幹的官員在免於社會壓力之下推行政策。發展型國家論主張以國家力量，主導後進工業國家的工業化（鄭為元，1999）。

年跌破百萬人。台灣目前在農村從事農事的就業人口已由 10 年前（2000 年）的 81 萬人降至 53 萬人，僅占總就業人口比重 5.1%。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台灣產業型態的轉型一路伴隨都市化的腳步前進，尤其從國內勞動力在空間上的移轉，正可描繪出台灣都市化的足跡。早期大批農村人口移至城市從事製造業、服務業，人口往都市集中後便形成都市化現象。廖正宏（1984）研究 1964 年到 1980 年間，台灣都市化程度從 59% 增至 66%，同期內都市人口增加 63%，而鄉村人口只增加 18%。1965 年至 1983 年間，都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且大城市人口成長速度比小城市快。這段期間所有總人口成長中，都市地區佔 80%，成長的人口主要來自鄉村人口的遷入。

進入 21 世紀，台灣人口往都市集中的趨勢不變。主計總處 2008 年公布的人口遷移統計顯示，從長期趨勢觀察，人口逐漸往北遷徙，導致南部人口逐漸減少，北部人口逐漸增加。北部地區近 20 年居住人口增加 1.09 個百分點，南部下降 2.12 個百分點，中部與東部各下降 0.68 和 0.56 個百分點。另外，暫時離開戶籍地超過 3 個月以上的暫離率，以雲林縣最高，達 29.46%，意即約每 3 個設籍雲林人的人口，就有一位外出工作、求學。暫離率次高的是花蓮 28.75%，台東縣、宜蘭縣、澎湖縣和嘉義縣市，也都超過 25%。這些外出工作或求學者，主要暫居地前兩名分別是台北市和新北市。

由上可窺見台灣的都市化成因是「城鄉移民」(urban-rural migration) 模式，即農村人口移居到市鎮，成為城市人口增長的主因，易言之，都市本身人口的成長比從鄉村來到城市裡的人口少。

關於造成「城鄉移民」的主要解釋為「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其認為造成遷移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排斥，或者是遷入地的拉力、吸引力交互作用而成(廖正宏，1984)，以台灣而言，即農業部門往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移轉後，農業式微，城市需求大量的勞動力，因而促使人們進入城市謀職。洪嘉瑜、陶宏麟及蔡智發(2003) 分析台灣各縣市居民的遷徙行為即符合「推拉理論」，他

們發現台灣內部遷徙行為深受地區的相對就業機會、相對薪資與相對產業結構等經濟誘因影響。

夏鑄九（1995）則從另一角度指出「城鄉移民」源於農業的破壞，人們大量離開農村是因為生活困難，三餐難以為繼，農業遭到世界市場商業網絡的衝擊，破壞原有的生產體系，人們移入城市是為了謀生、求生存，並非城市有工廠可提供工作。夏鑄九因而認為，雖然都市化往往隨同工業化發展，但都市化在數量上與性質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農業危機。林季平（2005）也觀察到 1980 至 2000 年間台灣的人口遷移及勞工流動，均呈現往都市集中（特別是北部地區）的結果，雖然此結果可促進人力資本於勞動市場中移轉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卻有惡化區域間人力資本的質與量不平衡的反向效果。

概言之，從宏觀面來看，人口遷移是與社會變遷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現象，台灣人口遷移反映的正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然而，從遷移者的微觀層面觀察，遷移者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後，必須適應新的社會情境、價值規範，始能融入新環境，逐漸改善經濟狀況、提升社會地位，達到所謂向上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宏觀面的研究，有助於掌握促成城鄉移民的結構因素，然而，唯有更加深入瞭解遷移者的行為模式以及個人特質，才能發現影響遷移效果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研究動機

城鄉移民是工業化及都市化過程中的顯著現象，以台灣為例，過去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討造成鄉村人口往城市遷移的原因，以及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後的影響，但對於鄉村人口在異地落戶後，是否發生社會流動？以及何以出現不同的社會流動的探討，卻相對稀少。本研究之所關切社會流動，在於社會的開放性往往體現於社會流動，英雄不怕出身低，任何人都可經由後天努力改變其社會階層。反之，處於封閉的社會，人們總是受限於固有的條件，是故強者恆強，弱者恆弱。

綜觀國內，雲林縣是人口外移最多的縣市之一，主計總處 2002 年「國內遷徙調查」，雲林縣的外流就業情況最為嚴重，有 19 萬人外流就業，就業者外流率達

13.27%。進一步比對 2000、2010 年主計總處的「人口及住宅普查」，雲林縣常住人口從 70 萬 5440 人降到 61 萬 8443 人，減少近 8 萬 7000 人，人口外流為各縣巔之巔。再者，追蹤雲林縣外流人口去向，發現主要移至新北市（原台北縣），粗估約有 40 萬的雲林人旅居新北市（高永光，2005）。分析 1980 年至 1990 年的資料，新北市移入人口的遷出地來源，除因 70 年代「都會內部移民期」吸引大量從台北市移出的人口（38%），其次就是來自雲林縣的移民（7.2%），其年齡多為 21 歲到 35 歲的青壯人口，且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以下的藍領（勞工）階級，工作集中在新北市境內的製造業（蕭新煌，1993）。

許多先後從雲林縣北上的人成立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彼此扶持、維繫情感，成為凝聚雲林鄉親向心力的重要組織。此外，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來自不同階級且遍佈各地，成為影響選舉的關鍵力量。大抵而言，同鄉會是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初級社會群體，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王效仿，2000），並具有思想交流及訊息溝通的功能（曹茂森、康維波，2001），再者，同鄉會一方面提醒會員對傳統文化的保存，另一方面可提倡有利於移入地社區發展的活動，有助於會員融入目前所居社區環境（李效玲，1979），且可協助移民適應遷移後的環境。

這些當年因故鄉謀生不易遷至新北市尋找就業機會的雲林縣外流人口，在歷經多年的城市生活後，每人的職業變遷、社會地位都有不同的結果。為何來自相同故鄉的人，後來的社會流動卻彼此不同？本研究將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為研究對象，希望找出影響其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研究目的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及「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被視為促成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社會資本」蘊藏在「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中，社會網絡愈豐富者，愈能從中獲取社會資源，其社會階層愈能向上流動。「人力資本」則泛指個人的知識、技能、資歷和素質，個人若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愈具競爭力，愈有機會提升自身的社會階層。

綜上，本研究假設「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是影響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目的在於調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

- 1、驗證他們在遷移前，其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模會影響社會流動結果。
- 2、驗證他們在遷移後，藉由建構社會網絡以獲取社會資源，可促使其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反之，遷移後，若無法順利建構社會網絡，其社會階層則可能向下流動或停滯流動。
- 3、驗證他們在遷移後，藉由累積人力資本，可促使其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反之，遷移後，若未能累積人力資本，其社會階層則可能向下流動或停滯流動。

第四節、研究範圍

以人口學而言，本研究對象「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成員」係歸類在「人口遷移」的範疇。廖正宏（1984）在《人口遷移》開宗明義即指出，在人口學的研究領域中，人口遷移的意義最模糊、最不清楚，因為它不像出生和死亡那樣明確，研究者常因研究旨趣或遷就研究資料的性質而對人口遷移有不同的認定。

在此限制下，本研究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統計」中對「遷徙人口」的定義，據以界定本研究範圍，惟主計總處對「遷徙人口」的定義是指「最近一年曾經換過居住地點超過3個月或預期超過3個月以上者」。然而，本研究旨在關切遷移後的社會流動情況，由於移民者遷移後，通常需要一段時間建立社會關係並融入複雜的職業分工系統，始能建構出社會網絡及累積人力資本，是故，社會流動的變化需要較長的時間脈絡才能判斷。

據此，本研究對象作為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係設定自雲林縣移入新北市累計超過10年（包括10年）以上且為「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者，再以移入新北市後的5年內作為界限，將此劃定為移民初期的適應階段，此階段在遷移過程中極為關鍵，其適應情況攸關遷移結果（謝高橋，1985）。

此外，在實證中社會流動的結果確實亦會影響社會網絡的建構及人力資本的

累積，進而對社會流動持續發生作用。然而，本研究關心的角度是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而非社會流動結果對建構社會網絡及累積人力資本的可能效應。為避免社會流動結果干擾本研究假設，造成因果方向的混淆，本研究藉由限定觀察移民 10 年以上者其最初 5 年的社會網絡規模及人力資本存量，再衡量移民者當前的社會階層，據此確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

第五節、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五章，本章緒論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第二章文獻探討，綜整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擇定本研究理論基礎。第三章研究方法，根據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並說明相關變項的研究分析方法及衡量，再據此設計問卷內容與抽樣調查方式。第四章是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以描述統計與迴歸分析進行各變項的統計數值檢驗，並分析驗證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和研究假設。第五章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二章、文獻探討

社會流動是一種具時間及空間特性的社會現象，其時間性係指它必須回溯個人生涯經歷，空間性則是涉及個人在社會階層的位移，因此透過探討社會流動理論以及相關實證研究，將有助掌握其內涵。在釐清社會流動的涵義後，本章進一步搜集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效應，據此輔證本研究之假設。

第一節、社會流動

1、社會流動的定義

社會流動一直是社會學關切的課題，社會流動與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是彼此關聯的概念，許嘉猷（1986）指出在邏輯和時間上，社會階層化應先於社會流動，需先有社會階層，才能有社會流動。一般而言，社會流動注重於個人（層面的研究），而社會階層則較為關切社會結構。許嘉猷分析社會階層化源於社會分工，因為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能時，他所能控制利用的社會資源就不一樣，因此社會階層化即在探討有價值的社會資源在社會上分配及控制的情形，社會階層則指社會上一群人享有同等的或類似的社會資源。

是以，社會流動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廣義來講，社會資源可略分為：生活機會（life chance）指所有經濟性的利益，包括財富、所得、健康及工作安定等；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政治影響力（political influence）（Bilton et al., 1987）。Judah Matras（1990）指出理想的社會型態是個人可經由努力改變社會階層的位置，這種改變稱為社會流動，而個人如何獲得某一社會位置以及有無可能取得屬意的特定社會位置，涉及社會的開放性（openness）或流動性（fluidity），因此思考社會流動時，即必須考慮社會結構的特性。由此觀之，社會流動涉及制度性因素，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將大為降低社會流動的頻率，反之，在公平制度的運作下，個人的社會階層才有變化的可能。

索羅金（P. Sorokin）1927年著作的《社會流動》是社會流動研究的先驅。他將社會流動分為：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指個人從一個社會位置移到另

一個同等的位置上；垂直接流動（vertical mobility），意謂個人移到另一個高低不同的社會位置，它包括了向上流動（社會階層上升）、向下流動（社會階層下降）。

Judah Matras（1990）在 Sorokin 之後擴大社會流動的面向，社會流動可指個人或團體由一個社會位置移動到另一個，或是由一個社會位置類別移動到另一個。個人社會流動類別，包括由專業團體轉移到管理職業團體，或是由低所得到高所得，由不具政治影響力到具有重大影響力。此外，社會流動依世代區分可分為，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指經由比較上下兩個世代的社會階層，評斷是否出現改變；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則是探討個人一生中的社會位置是否有所改變，主要觀察其職業生涯的動態。

至於，造成社會流動的原因，依索羅金的歸納分為三大類，即人口特質，環境之改變（主要為技術變遷），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天生能力不一致。雖然 Sorokin 引起社會學界對社會流動的廣泛興趣，但直到 1967 年 Blau 和 Duncan 二人合著的《美國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出版後，他們以相當複雜嚴謹的統計方式——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探討美國人民在教育、職業方面的成就受其社會出身（父親的教育與職業）的影響有多大？他們提出的「地位取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成為後來學界研究地位取得的基本模型（許嘉猷，1986）。

地位取得模型可說是社會流動研究方法的典範。基本上，地位取得聚焦在影響個人社會經濟成就的因素，包括個人的出身、智能、教育程度等。關於社會地位取得，主要來自繼承基礎（ascribed bases），意指人出生在貧富的家庭，就具備決定其未來社會位置的特性。有些人出生時雖不具備足以決定位置的特性，但因為生於特定的家庭或團體（比如屬於某一家庭、居住某一城市、隸屬某一教會），都可能賦予某人有特別的賺錢、受教育或取得影響力與權力，這些讓他獲取某些特性的有利條件，稱為特殊基礎（particularistic bases）。倘若沒有上述條件，一個人仍可經由本身的行動或努力而取得改變社會地位的特性，比如儲蓄、購置

財產、參與政治活動，這些特性是位置與地位取得的成就基礎 (achieved bases)。
(Judah Matras, 1990)

至於如何評斷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最直接的方式是透過職業辨別，由於現代社會個人的位置主要由職業決定，雖然不同的社會對職業隸屬何種階層有些微差別，但往往薪酬、權力、聲望較高的職業，其所處的階層亦較高 (許嘉猷, 1986)。

此外，社會學學者認為社會流動牽涉社會階層的變化，因此必須掌握社會階層的組成要素，即聲望 (prestige) 及經濟性的評價 (如職業聲望)。聲望意指社會榮譽 (social honor) 或地位 (status) 的分佈情形。在社會科學上，韋伯 (Marx Weber) 是第一位有系統探討聲望或地位與社會階層之關係的學者，然而韋伯對聲望的研究，主要為理論描述，而非經驗研究，真正對職業聲望有系統研究的是社會人類學者華納 (W. L. Warner)，他以聲望做為社會階層化的主要基礎對美國洋基城進行研究，洋基城市民的聲望或社會階層的高低，乃是依據洋基城居民相互評價的結果，華納將洋基城的居民分為六個社會階層，每個階層各有特性，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們，也表現出不同的階層行為和社會參與 (許嘉猷, 1986)。

對社會階層進行測量必須使用指標。常用的社會階層指標，如愛德華量表 (Edward's scale, 1938)，偏重經濟面向的衡量，將職業分為六大類職業，十個等級，因此後來另有 North and Hatt 聲望量表 (1948)，它是主觀性的量表，由受訪者評定每一工作應屬何一等級，等級從好到不好，分作五級，一共採取了 2920 個樣本，並求得平均數，轉化為百分位數，而得到九十種職業聲望量表。近期直到 Duncan 才納入社會性的評價，即所謂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 (Duncan's SEI, 1961)，其量表係將每一職業的職業聲望，配合每一職業的教育程度與收入，而求得職業聲望、教育和收入三者之間的迴歸方程式係數，而得每一職業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 (socio-economic index) (許嘉猷, 1986)。

國內學者另依台灣的職業特性製訂量表。瞿海源、蔡淑鈴 (1989) 訪問 1422 名大學生，建構一份包含 154 種職業類別的主觀職業聲望量表，主要呈現大學生

心目中的職業結構。瞿、蔡兩人另以全省性的官方調查為資料來源，並以工作所得與教育程度為具體指標，分析 82 種職業類別的社會經濟地位，藉此分析教育、收入及聲望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瞿海源、蔡淑鈴的調查對象並未包括一般民眾的主觀聲望評價，且因時空因素無法評估後來的新興職業，因此黃毅志(1998)參考 1992 年行主計總處的新職業分類，建構出「社會變遷調查新職業分類」，該分類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研究以及多項調查採用的指標。

然而，黃毅志 1998 年建立的「社會變遷調查新職業分類」屬名目尺度，至多只能轉換成五等職業社經地位測量，在運用上受到若干限制。因此黃毅志(2003)在此分類架構上，進一步建構「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幾乎納入台灣所有職業。然而，該量表仍有部分限制，如在台灣就業機構裡，特別是公私部門或部門規模，也是界定個人社會地位的基礎，例如同為大學教授，但公立大學教授的聲望與地位，則可能比私立大學高；大公司的總經理的聲望與地位也比小公司的總經理高(黃毅志，2003)。

至於國際間最常使用的職業聲望量表是 Treiman 在 1977 年建立的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 (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 SIOPS)，Treiman 整理不同國家的職業聲望資料，再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國際職業標準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SCO) 轉換為統一標準，因此廣受國際採用。此後，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根據 ISCO-88 建立新的「國際標準職業聲望量表」(SIOPS) 與「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雖然上開量表未必能含括台灣所有職業類別，但與國際標準一致，因此常用於國內外相關研究。此外，本研究關切的社會流動涉及社會、經濟層面，Ganzeboom 與 Treiman 1996 年建立的 ISEI 可提供評斷基準，因此將作為本研究量表。

2、國內外的社會流動研究

都市地區相較於鄉村地區因為具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職業分化、較佳

的待遇以及職業聲望，因此容易吸引鄉村居民流入，國內外的研究基本上都有類似的發現。

道格·桑德斯 (Doug Saunders) (2011) 提出在開發中國家與西方世界中，成功的落腳城市 (arrival city) (指移民者起先抵達城市的落腳處) 都是創造新興中產階級、消除鄉下貧窮以及終結社會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因此必須把落腳城市理解為一套功能，其功能包括：維繫人際關係及社會網絡的中繼站、獲得教育、學習勞動技能、進入城市就業市場的媒介機制、協助安定立足的平台 (透過人際網絡找到房子住或買到便宜的房子、土地佔用)、提供社會流動管道。

簡言之，Doug Saunders 認為落腳城市是社會資本的貯藏庫，也是創造及分配社會資本的機器，同時具有提升人力資本的機制，讓初來乍到的城鄉移民者，可以發展社會網絡並增進其人力資本，進而獲得提升社會流動的動力。

李春玲 (2007) 根據中國大陸第 5 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 2002 年流動人口全國抽樣調查數據發現，大部分的農村移民的確實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經濟地位提升，但受限於「二元戶籍」制度，農村移民獲取上升的社會流動機會明顯少於城市居民。農村移民可取得較高階的位置是中小企業主或管理者，甚少能成為正規經濟部門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及政府機關幹部。有別於城市居民常可透過常規的社會流動路徑 (出身背景、人力資本投資、工作資歷累積)，農村移民的社經地位獲得模式，則需仰賴社會網絡、機遇、冒險等非常規因素。

至於台灣的社會流動研究，謝高橋及張清富 (1997) 指出，早期台灣社會工商業不發達，工作機會有限及職業結構簡單，當時的城鄉移民教育程度偏低，大多從事操作、服務及體力勞動工作，但隨著工商業發達後，創造許多白領階級、聲望較高的工作機會，遷移者轉而以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行政及主管等工作機會居多。整體而言，在社會流動的趨向上，從鄉村前來都市的人，大都屬社會經濟地位上升流動者。

再者，台灣階級結構的變遷與經濟結構轉變有關。蔡瑞明 (1997) 指出勞動

市場的結構轉型促使大量農村子弟進入工業及服務業，固然為農村子弟帶來許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從交換性的流動上來看，父子兩代間的傳承，在四十年來，並無劇烈的變動，此意味結構轉型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大於個人的努力。

孫清山、黃毅志（1997）觀察到台灣因快速的職業結構變遷，連帶增加許多專技、管理、佐理人員的職位，很多勞動工人向上流動成為此階級（不論是代內或代間流動），近年又因服務業的擴充，提供許多勞動工人代內向上流動成為買賣服務人員的機會。孫、黃兩人認為相較於西方等工業先進國家，台灣由於勞動工人的家庭背景異質性大，向上流動的機會又多，反而有礙勞動工人階級的形成。

細究國內社會流動模式，謝國雄（1989）指出，台灣特殊的產業結構以及外包制度帶來階級流動的機會，形成獨特的「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路徑，顯示勞動者在其生命史中採取自求多福或是小頭家化的策略來抗拒「普羅化」

（proletarianization）的趨勢。但謝國雄強調台灣特殊的零細化產業結構及普及的外包制度，自行創業極為多樣（單人工作坊、家庭工作坊、單一事頭工廠等等），因此「頭家」也極為多樣，故階級流動必須置於台灣當地特殊的零細化產業結構及勞動過程來看才有意義。

關於台灣階級流動的特性，黃毅志（2001）的研究結果基本與謝國雄的結論一致，台灣隨著民眾工作生涯發展，現部門為老闆階級的比率（40.2 %），高出初部門為老闆的比率（25.8%）許多，而且初為老闆者大多數現在仍為老闆，此外許多初為其他部門的受雇者，現在也當上老闆，特別是在服務業當老闆，就算只是小老闆，但工作自主性、收入都高。

上述可見，台灣的階級流動最鮮明的是自行創業模式，然而，根據林宗弘（2009）分析中研院 1992 年至 2007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樣本發現這股趨勢已日漸式微，他指出在階級結構方面，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另外技術工人與專業者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上升，促使「黑手變頭家」式的社會流動逐漸消失。至於資本家子女的階級流動優勢仍在，但教育成就的代際繼

承或者知識份子階級自我複製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強。

遷移雖然往往可製造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遷移不必然帶來向上的社會流動，遷移者仍需克服適應障礙。謝高橋、張清富(1997)提出遷移是一種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因為遷移者不僅改變居住環境，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更是遷徙者的一大課題。一方面遷徙者放棄舊有的社會關係，喪失原有網絡的支持，同時也失去原先所建立的社會規範與價值。另一方面，遷移者到陌生的都市環境後，都市的初級關係薄弱，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尚需一段時日，因此，他們常對新的環境產生恐懼與不安，形成社會適應問題。謝高橋(1985)針對高雄市遷入人口社會適應的研究即發現，初期建立良好的適應會維持並發生正面作用，因此，移動者的初期適應是影響其在目的地生活調整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建立了適應，則不易改變。相反地，移動者到了新環境如不能即刻建立良好適應，他可能會因適應的問題而導致生活的不穩定。

上述文獻突顯遷移可提供個人的社會流動機會，社會流動的特性亦與產業結構及生產模式有關，台灣的社會流動即以「黑手變頭家」為代表。至於，個人能否順利達成社會流動，一方面涉及體制可否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大陸的二元戶籍制度造成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公民權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個人能否適應遷移後的改變也是重要關鍵，由於遷移意謂個人必須重新建立社會關係，並且進入新環境求職謀生，因此，遷移者的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不僅攸關其適應情況，並將影響往後的社會流動。

第二節、社會網絡與社會流動

1、社會網絡的涵義

社會資本是奠基於社會網絡而成的理論，故可將社會資本看作是蘊涵在社會網絡中或是通過社會網絡所能得到的社會資源。回顧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有助於理解社會網絡的內涵。1980年代末期，歐洲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到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主導當前政策與社會科學的思維，但他們卻忽視社會及經

濟生活裡許多領域的重要性，經濟學的正統刻意將自己限縮在社會認定的「經濟實踐」範圍，但這麼做無視於以下事實：「資本展現在三個基要的類別上，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David Halpern,2005)。Bourdieu (1992) 如此定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資源的總和，它能加諸個人或群體，方法是透過擁有一個具有持續性的網絡，此網絡則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識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瞭解這個事實，是我們解釋分化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

Bourdieu 認為在大多數形式的社會資本都具有三種基本元素，網絡 (network)；由群體內的成員所共享的規範、價值觀及期待 (norms, values and expectancies)；有助於維持規範及網絡運行的約束力量 (sanctions)，如懲罰或獎勵 (David Halpern,2005)。

一般將社會資本區分為「微觀層面」與「鉅觀層面」。「微觀層面」指社會資本是從日常生活中的互動開始累積，即布迪厄所說的在社會網絡中個人享有的物質優勢。

至於「鉅觀層面」，美國學者科爾曼 (James Coleman) 視制度性的結構為社會資本的一部分，包含一個國家或社群正規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世界銀行 (World Bank) (1999) 也試圖將社會資本的概念操作化，它為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定義：「社會資本指的是形塑一個社會中社會互動質量的制度、關係及規範。愈來愈多的證據指出，社會凝聚與否，對它是否能擁有經濟繁榮或永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社會資本不僅是依附在社會底下的制度總和，它還是使它們能緊緊一起的黏合劑。」

很多研究者則認為，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的海納百川式定義是走過頭了，他們擔心將政治、法律與制度性結構納入定義，反而使此概念變得難以掌握，並且使原本極受忽視的領域 (非正式網絡與規範的重要性) 更得不到注意 (David Halpern,2005:15)。

上述可知，若將社會資本擴至過於廣泛的制度性結構，將致使該概念流於鬆散、意義混淆，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構成社會資本理論基礎的社會網絡，觀察城鄉移民者的社會網絡如何影響其社會階層的變化。

以 Bourdieu (1986) 的觀點，「社會資本」即為一種通過「體制化關係網絡」的占有而獲得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而個人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少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行動者可以有效加以運用的聯繫網絡規模大小；二是網絡中每個成員以自己的權力所佔有的（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資本數量的多寡。

學術界將「社會資本」研究投向「社會網絡」的代表人物是 Coleman (1992)，他認為所謂的「社會資本」是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於人際關係和結構之中，並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因此要獲得社會資本只有通過成員資格和網絡關係才能獲得回報。「社會資本」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三個方面。因此，個人參加的社會團體越多，其社會資本越雄厚；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異質性越強，其社會資本越多。

另外 House 等學者(1988)將社會網絡分為結構與過程兩個部分。結構部分可分為社會整合與網絡結構(social network structure)，前者指社會關係的存在或數量（即所接觸的個體總數或是頻率），後者是社會關係的結構特性，包括互惠性、持久性、密度、同質性。簡言之，前者是量的呈現，後者是質的特性。

在 House 的認定中上述結構會透過三種過程影響個人，分別社會支持、關係的強求(demand)和衝突(conflict)、社會規範(regulation)或社會控制(control)。社會支持指社會關係的正向品質，並且要有實際的行動，這種支持可能是情感性的、工具性的或訊息性的；關係的強求和衝突指社會關係是負向的或衝突的；社會規範或社會控制指社會關係所具有的規範性作用或控制性作用(賴威岑，2002)。

綜上，可將社會網絡歸納為一種連結社會資源的群體關係，在此關係中蘊含的資源即為社會資本，故從網絡中成員的互動模式以及成員所具有的資源含量可

衡量社會資本高低。

2、社會網絡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由於現代社會的經濟地位及政治地位均可反映在職業地位上，職業遂成為社會分層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標，職業流動便可視為觀察社會流動最主要的標記。關於職業流動的起點，一般可從謀職著手，許多就業市場的研究發現社會網絡在此環節扮演明顯的作用，研究證實有相當高比例的工作是透過「非正式管道」找到的，亦即經由私人關係或口耳相傳。Eby (2001) 發現在移民或遷居者中，能夠利用個人網絡的人往往可以找到較佳的工作。Aguilera (2003) 也發現經由個人網絡可以找到較持久的工作。

最著名的社會網絡與就業關係的研究是 Mark Granovetter 的「弱連結」(weak ties) 理論。Mark Granovetter (1973) 指出與關係疏離的同事、遠親和朋友的連結的人(弱連結)，可在勞動力市場裡佔盡優勢；透過這些連結，也就是架接網絡的社會資本，個人能接觸到範圍更廣、更多的資訊及機會。

上述是 Mark Granovetter 著名的「弱連結」理論，突顯出社會網絡對經濟行動的影響。他認為在個人的網絡關係中，能提供幫助和重要信息的關係，並不是親密或熟悉的人(強連結，Strong Ties)，而是那些關係較疏遠的人(弱連結)。Mark Granovetter 的解釋是強連結代表同質性，而在同質性高的網絡中，信息有較大重複性和剩餘度，故對個人的幫助不大；而弱連結是異質性，它可擔任不同社群之間的「關係橋」，提供個人豐富、有價值的信息。研究顯示，當網絡規模增加時，求職者可獲得更多的信息從而就業可能性更大，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Korpi, 2001)，進而更加促進求職者的社會融合。

相較於西方社會，邊燕杰對華人社會的研究卻顯示與 Mark Granovetter 不同的情況。有別於西方，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國人重視的是「強連結」，原因是中國人重視人情，從熟識的網絡反而可以獲得更多訊息，有助於找到理想的工作。邊燕杰的論點可從大陸農民工的社會網絡研究獲得驗證，多項研究指出通過來自政

府、社會正式組織的支持（正式制度）之外的社會網絡的建構，藉由非正式的社會支持（來自家庭、親友、鄰里、同事和非正式組織）可以幫助農民工逐漸累積社會資本，獲取社會資源，更加融入城市社會的生活中，提高他們在城市生活的滿意度（李漢林，2003；王奮宇、趙延東，2003）。

中國大陸許多的調查亦顯示，在農民工的生活交往中，鄉土的社會網絡一直發揮重要的作用。研究指出農民進入城市帶來職業及生活方式的變化，並未根本上改變他們對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網絡邊界，城市農民工社會關係結構中的基礎仍然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為核心的初級關係（李培林，1996；曹子瑋，2003）。李培林（1996）進而提出，流動農民工在社會位置中對血緣、地緣關係的依賴，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節約成本，相對於他們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來說，是一種非常理性的行為選擇。

于若蓉（2009）針對台灣的調查研究顯示，透過弱連結尋職的受訪者，無論以薪資率或職業社經地位來衡量尋職成果，均較透過強連結尋職者為佳，研究結果支持 Granovetter (1973) 的「弱連結的力量」假說。于若蓉同時發現「弱連結的力量」假說僅對原本社經地位較高的受訪者成立，而對原先社經地位較低的受訪者而言，運用強連結或弱連結尋職並不影響受訪者所取得的職業地位、薪資率。

于若蓉（2009）這項分析結果印證林南（Lin）等(1981a, 1981b)的社會資源理論，連結強度本身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透過連結所能觸及的社會資源；如能觸及較豐沛的社會資源，對尋職者取得的職業地位會有正面的助益。依社會資源理論，社會階層結構如同金字塔，金字塔頂端者人少，卻有最高的地位、最豐富的社會資源；位居低層者多，可控制的資源卻是最少。

林南（2001）對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²的關係進一步提出，所謂的社會資本是指一個人透過社會網絡，能夠直接或間接接觸到，並可能動用來達成行動目標之人際資源，因此社會資本越多，越能夠從親朋好友獲得協助，藉以取得好工作。

²根據于若蓉（2009）的解釋，就社會資源、社會資本兩項概念，Lin 等(1981a, 1981b)著重的是前者，而在 Lin (2001)一書中則將兩項概念混用，而未予以區分。

社會資本可再區分為「接觸的社會資本 (access to social capital)」與「動員的社會資本 (mob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前者指在社會關係中，可以運用的資源，稱之為資源的能量 (capacity)，後者指實際上所運用的社會資本，稱為資源的運用化 (utilization)。林南 (2007) 強調，過去認為社會資源必須運用了才可計算，但能量的象徵性力量很強。林南以勞動市場為例，一個人若網絡廣闊，他不用找工作，就會有朋友主動幫忙介紹工作，因此網絡的重要性就是其能量，只要有這能量，(工作機會) 就會主動和你接觸。

蔡芬芬 (2007) 的研究也顯示社會網絡連結的對象比其社會網絡規模更具效用。她指出，求職者與被介紹者若有高社會地位者提拔，此效果遠勝過豐富的人脈關係，意即與其認識很多地位平平的人，不如只認識一個地位崇高的人，對自己還更為有利。

曾旭正 (1993) 對新北市城鄉移民的社會網絡研究發現，其連帶關係也發生在就業和居住地點的仲介上。譬如在 6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初期，許多小工廠即透過親友連帶的方式引進學徒解決人力短缺問題，之後學徒又自立門戶，形成更大的生產網絡。對遷移者而言，在親友或同鄉的連帶下，先行者的居住地往往就是移民者離鄉後的第一個落腳點，親族網絡因此成為初期安頓的主要協助力量。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於影響個人事業成功的原因，在「社會網絡資源 (貴人相助)」的重要性上有普遍的共識 (關秉寅、黃毅志：1997)。

此外，謝高橋 (1985) 發現當遷移發生後，遷移者雖然離開原居地，但不表示原有的社會或親族關係便會中斷，這些關係可能會繼續維持，並對遷移的調適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遷移者可透過親戚互訪及金錢協助的方式維持與原居地的關係。另一方面，遷移者在新環境裡需要團體的參與及認同，這部分則須與遷入地建立新的社會關係，且主要基於非親族原則的結合，如友誼與鄰里關係。

Doug Saunders (2011) 也觀察到落腳城市與來源鄉村 (遷移者的原居地) 有著長久而緊密的聯繫，藉由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動，促使下一波的村民遷

徒活動得以發生，形成連鎖式移民，同時來源鄉村也從外移者寄回的金錢，獲得用於照護村裡老年、教育年輕人、以及建設村莊的資金。

儘管東西方社會因社會結構、文化的差異，導致強弱連結在訊息提供及就業協助等方面有不同的效用，但總體來說，無論在東西方，由社會網絡連結的社會資本所發揮的效用仍然極為顯著。從社會網絡架構起來的社會資本有助於解釋，為何中上階層的人其向上流動遠較向下流動來得普遍，原因即是中產階級家庭具有豐富的社會接觸，出生於此的小孩，即便能力較差，仍能找到好工作，相反的，勞工階級的孩子，則必須靠自己力爭上游 (Aldridge, 2001)。

不過，仍有人質疑社會網絡所蘊含的社會資本促成社會流動的因果關係方向。當然，多數的研究基本上是橫斷性 (cross-sectional)，只在某個時間點上測量變項間的關聯。人們可能因為順利找到工作、當前工作的角色、表現或是財富，而導致擁有較廣泛的社會網絡或較高的薪資 (David Halpern, 2008)。然而研究基本顯示，在勞動力市場效果的關係中，大多數的因果關係都是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 的影響結果，例如追蹤大規模裁員之後的貫時性研究呈現，那些具有較廣泛社會網絡 (尤其是與目前占有職位者的連帶) 的人，較有可能取得新工作 (White, 1991; Six, 1997a)。

至於，針對社會網絡與其所得的因果關係，在證據上則較不具決定性，能夠看到的事實是：愈廣泛的社會網絡，能讓你在起跑點上略占優勢，但同時也需要具備相關的技能以延續自身的優勢 (David Halpern, 2008)。因此本研究將技能的變數納入，總括以人力資本作為另一影響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人力資本與社會流動

1、人力資本的涵義

人力資本是源自於經濟學的概念，相對於物質資本 (包括廠房、機器、設備、原物料、土地等)，它泛指後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技術、能力和健康等質量因素之總和。1950 年代經濟學者發現古典與新古典成長理論受限於實體資本的束

縛，因而無法解釋長期的經濟的成長，以及生產力水準並未趨向一致的情況，因此提出生產技術並非外生變數，而是內生決定於知識存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茲（Theodore W. Schultz, 1902—1998）對人力資本的論述為，體現在人的身上，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資歷、經驗和熟練程度等，整體而言表現為人的素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是稀缺的，特別是企業家型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健康的投資形成的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和健康支出是生產型的；人力資本像一切資本一樣，都應當獲得回報（姜繼紅，2005）。

舒茲之後學者陸續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如下：

研究者（年代）	研究論述
Schultz（1960）	員工所具備的技能與知識能夠提高生產力，因此可將之視為一種資本。
Becker（1964）	員工所接受的教育，可為其帶來技能，並提高生產力，為其帶來工資。
Mushkin（1962）	將健康視為人力資本構成要素之一。
Solow（1970）	個人的生產技術、才能及知識。
Grossman（1972）	健康亦屬人力資本，假設每人與生俱來定額健康存量，雖隨年齡增長折耗，惟可透過投資以增加其存量。
Snell & Dean（1992）	個人擁有具經濟價值之技能、經驗及知識。
European（1994）	個體能促進經濟、社會及個人福祉的知識、訓練、能力及態度。
Kaufman（1994）	個人投資於教育及訓練，可提升其技能，增加生產力及其個人所得。
Baron & Hannan（1994）	在勞動力市場具有價值之個人特質。
Edvinsson & Malone（1997）	包含個人能力、技術、經驗及知識等，亦涵括創新能力。
OECD（1998）	個人所具備與經濟活動相關之知識、技術、能力及其他特質；其中經濟活動泛指個人、機關或非市場機制，例如家庭工作、社團或志工等。人力資本除有助經濟成長，藉由知識和技能之學習，亦影響社會行為，擴及環境、社區參與等層面，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福祉。
Dess & Picken（1999）	深植於個體之能力、知識、技能與經驗。
Luthnas（2004）	個人經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知識及創意想法。

資料來源：邱惠玲等人（2005），〈建立人力資本統計之研究〉。

綜上可知，儘管學者對人力資本各有不同見解，但彼此交集處為人力資本係

指包括知識、技能、經驗、健康及創新能力等項可增加經濟收益的個人能力。至於，實際使用的人力資本指標體系尚未有一定標準，但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ion, OECD）的人力資本指標較常被採用，我國主計處亦以此為基礎。

邱惠玲等人（2005）指出，OECD 的人力資本指標內容強調終身學習隱含時間歷程概念，前期投入（投資），累積為本期成果（存量），並於下一期展現成效（投資報酬）；在當期存量基礎下，續於下期進行投資，再於其次期展現投資報酬；周而復始，維繫經濟成長動能。因此評估人力資本須考量其多面性。形成管道如下：

- （1）學習：包括幼兒早期照顧及非正式環境中之學習等。
- （2）正規教育：包括學校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及高等教育等。
- （3）非正式在職訓練：包括企業非正式訓練和政府勞動市場訓練等。
- （4）專業訓練：工作所需特殊經驗或技能訓練，例如 R&D 訓練等。

從上可知，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正規學校教育、在職訓練或在實踐中學習，以及職業選擇等方式獲得。教育和在職培訓在人力資本形成和累積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一個人要順利就業就必須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在現代經濟學看來，是勞動者藉以獲得勞動報酬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它是投資的產物，沒有投資，人力資源絕不可能發展成人力資本（紀樹立，1987）。

至於，如何測量人力資本？邱惠玲等人（2005）根據 OECD 人力資本指標為基礎所建構的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表 2-3-2），另從「投資」、「存量」及「投資報酬」3 構面中，擇定「存量」作為測量範圍，過去的投入（投資）累積為目前的產出（存量），並於未來回饋（投資報酬）。

表 2-3-2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與 OECD 比較

OECD 人力資本指標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		
構面	涵蓋範圍	構面	面向	涵蓋範圍
存量	教育存量	存量	教育存量	有關教育程度、教育分布、專技人力、國際教育交流等方面
	技能存量		技能存量	有關科技研發、技術移出入、職業證照、推廣教育等方面

OECD 人力資本指標		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		
構面	涵蓋範圍	構面	面向	涵蓋範圍
			健康存量	有關客觀、主觀指標等方面
投資	財務投資	投資	財務投資	有關整體、部門別等方面
	時間投資		時間投資	有關教育、技能等方面
投資報酬	經濟性報酬	投資報酬	教育報酬	有關工作、收入等方面
			技能報酬	有關收入、生產力等方面
			整體報酬	有關人力供需、整體效率、整體報酬率等方面
	非經濟性報酬			

資料來源：邱惠玲等人（2005），〈建立人力資本統計之研究〉，該表內容參考韓志翔、張文菁（2001）。

OECD 設定的人力資本指標強調教育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此點與舒茲的理念一致，透過教育（無論是正式、非正式、職業訓練）可以轉化為知識的存量，從而提高人口的知識、智力和技術水平。舒茲指出「教育主要是一種為了增加未來收入和未來滿足而進行的投資。」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收益包括，一是帶來較高的經濟收入，二是生活質量的提高，三是對個人收入較合理的支出，四是個人具有未來較大的職業機動性（姜繼紅，2005）。

整體而言，根據舒茲的研究，從人角度來看，人力資本帶動的就業遷徙是重要的收益之一。其收益包括獲得更高的收入外，亦可找到合適的工作，實現自我價值和家庭的幸福，並且藉由勞動力的流動，享受到遷入地和遷入單位的各種服務和待遇，這些待遇包括發放的物資以及孩子教育、住房的改善等等（姜繼紅，2005）。

綜上，可見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投資差異性，物質資本是外顯的體現在廠房、機器、設備等硬體項目上，而人力資本主要是內在的體現在人的體能、智能與技能的改進上，因此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相較於物質資本的投資，具有相當廣泛的多樣性，除前述的教育投資，尚可經由保健投資、職業培訓、人力遷移投資以及信息投資等，藉以達成擴大生產能力並提升經濟效率（張鳳林，2006）。

2、人力資本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大抵而言，個人可經教育、職業培訓或是職場歷練等管道增加人力資本，隨著人力資本的增加，職場的競爭力便愈具優勢，愈能獲得更佳的報酬，且人力資

本豐富者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適應能力，因此愈有機會達成向上的社會流動。

謝高橋、張清富（1997）分析行政院戶口普查處（1992）的報告即發現遷移人口以中等及高等教育為多，其中以高等教育者遷移到都市地區更為顯著，顯示教育程度愈高者，具有豐富的學識與技能，資訊亦較多，成就動機較高，適應環境能力較佳，因此，有利於移動行為。整體而言，台灣早期的人口遷移，其教育程度大致以中等教育居多，晚近則高等者較為明顯，這與台灣教育普及與平均教育程度提高有關。

關於人力資本對國內社會流動的影響，蔡瑞明、葉秀珍（2011）指出過去在以農為主的社會，人們大多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工作，社會流動較少，個人也鮮少接受正式教育，工作的選擇不多，但在進入工業化社會後，新一代必須離開家園，投入外地的勞動市場，往往須透過家庭以外的管道謀得技術，起先是「學徒制」，到後來普遍的國家教育體制後，教育成就便對個人職業的取得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根據研究，家庭背景如父親職業、教育地位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有顯著的影響，意即父母親可透過教育讓子女獲取資源，使子女在職場受惠。因此，個人可利用教育、初職的優勢地位來獲得勞動市場上的較高的報酬，反之，出身在家庭背景較差的孩子，未來的職業發展就受會到比較多的限制。

慶幸的是，隨著教育的普及，階級屏障變得不再難以跨越。王德睦、陳宇嘉、張維安（1986）將教育機會的分配視為社會流動的重要媒介，他們比較 60 至 80 年代的資料發現，越年輕的人越有受高教育的機會，顯示越年輕的人其教育成就越不受其父親的影響，象徵台灣的教育機會走向均等。

教育對個人謀職的助益極為明顯，依照審核理論（screening theory）雇主在雇用某人前，並不確定他的生產率高低，因此雇主需要尋求一些可以代表生產率的指標，教育就被認為是一種相當重要的判斷信號（signal）（許嘉猷，1985）。至於，個人謀得初職的地位情況，不分城鄉皆以教育的影響最大，再者，個人現在的職業地位主要的影響也是來自初職（張峰彬，1993）。

此外，從城市的產業發展來看，遷移人口的人力資本差異與不同階段的都市功能有關。曾旭正（1993）分析新北市的移入人口提出，在工業化初期，都市是主要的生產基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青壯勞工，所以在 1963 年至 1972 年間，15 歲至 19 歲的移民超過 8%，該年齡層可能多為年輕學徒；1970 年代起，一則因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教，孩童受教年限提高，另則都市的貿易管理功能逐漸發展，所吸引的移民偏向教育程度高、有專門技術者；最後，移入人口集中於 25 歲至 35 歲人口，顯示經濟結構轉型促使都市功能轉變，與前兩階段完全不同。

關於人力資本與社會階層的關聯性研究，瞿海源、蔡淑鈴（1988）的研究也證實，「教育程度愈高，則收入、職業聲望愈高。」張茂桂（1986）利用台灣地區的社會變遷資料分析出不同階級的受教育年數，優勢階級是 11 年，中產階級是 12 年，勞動者階級則只有 7 年，明顯呈現中上階級與底層階級在受教育年數上的落差。

曾淑芬（2001）以電話訪問台灣 531 戶之戶長或主要收入者，發現人力資本對職業地位取得及流動均具有相當的解釋力。研究指出資深程度及學歷高低決定個人的社會聲望及收入；個人擁有較高的資訊技能及技能訓練機會可增加個人的職業聲望及收入；勞力密集產業勞工有明顯的向下流動，技術密集的勞工則較有機會向上流動，而技術密集勞工收入也明顯高於勞力密集勞工。

中國大陸的研究也顯示，人力資本對農民工的影響顯現在職業流動及經濟收入。姚先國和俞玲（2006）的調查指出，職業培訓對外出勞動力成為生產工人或從事服務業具有顯著影響，相較於未受過職業培訓的勞動力，職業培訓對促進服務業就業有近 6% 的作用，對促進工業生產部門就業則有 21% 的作用。趙延東等人（2002）的研究提出，職業培訓對農民工經濟地位的影響與其所受的正規教育作用幾乎等同，經由職業培訓不僅可獲得新的人力資本，而且可為流動者原有的人力資本提供一種有效的補充和轉化方式。曾旭暉（2004）研究城市生活本身具有人力資本再生產的意義，而務農經歷可能導致相對消極的影響，因此農民工在

城市生活本身是通過工作經歷增加自身人力資本的過程，並對其向上流動和職業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王春光（2007）從人力資本配置制度觀察大陸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流動，他認為若要解決大陸農村流動人口不能有效的通過職業轉換實現社會地位的改變，不僅是改變戶口制度即可，而是必須進一步系統化的改革人力資本配置制度，因為根本性原因是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教育水平偏低，因此必須經由企業培訓或是政府的技能訓練才能提高其人力資本。

綜上實證，可見無論經由正式的學校教育、在職訓練或是在職場實地累積技能，對促進個人職業升遷以及提升社會地位均有效益，因此本研究擬將人力資本設為影響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其社會流動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緒論及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並說明各相關變項的衡量與研究分析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得知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均有助個人謀職並取得更佳的社會位置，故本研究假定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新北市的雲林縣移入人口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正面效益。本研究分別以社會網絡的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及人力資本為自變項，社會流動的情況為依變項。變項之間的關係如圖 3-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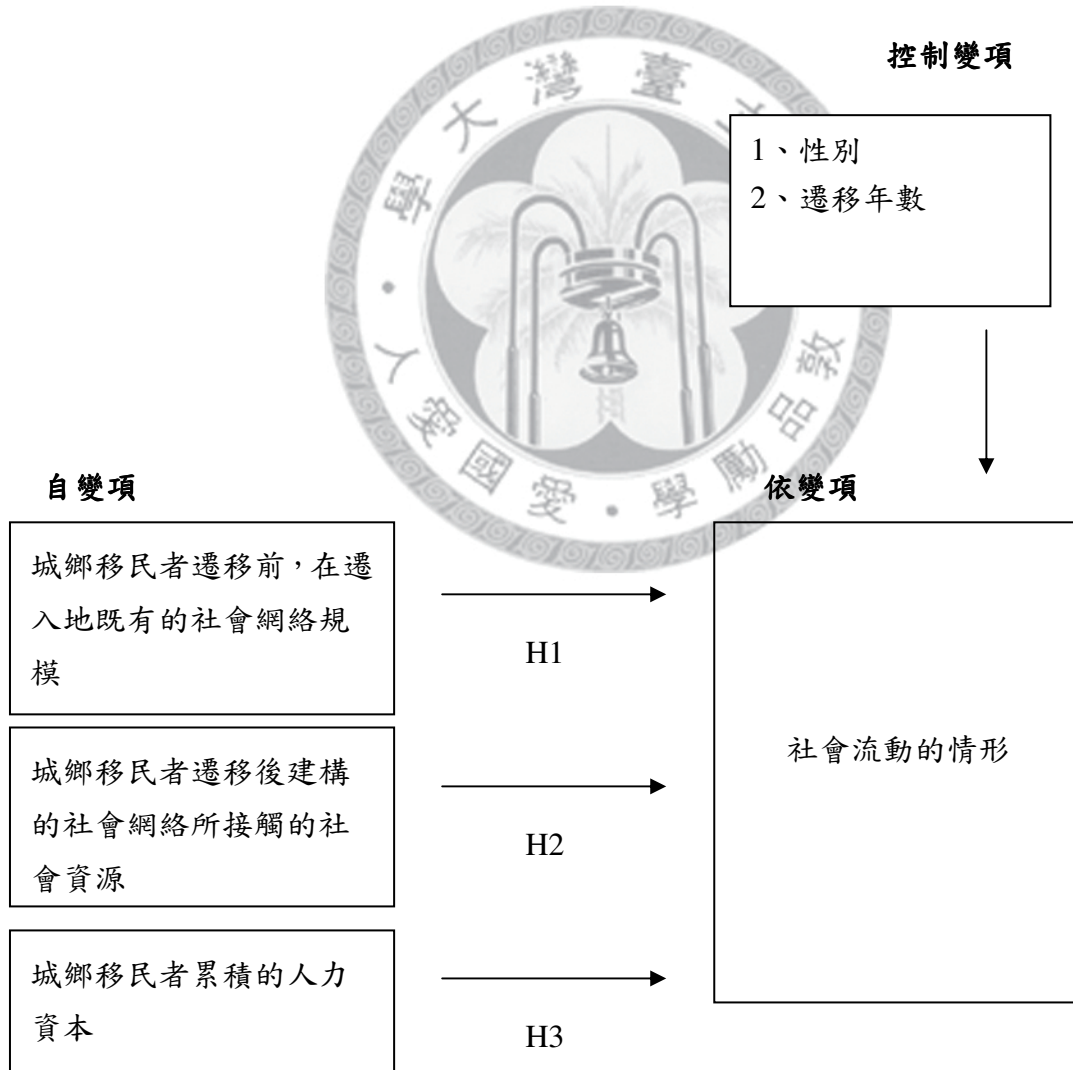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為：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的多寡均會影響城鄉移民者的社會流動。個人的社會網絡規模及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愈多，或者自身的人力資本愈豐富，抑或兩者兼具，均有助於提升城鄉移民者的社會流動。

假設一 (H1)：城鄉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模愈大，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在先前的文獻發現，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若已有親友，這些社會網絡可協助其適應遷移後的環境、謀職、創業等，因此本研究假設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愈大，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假設二 (H2)：城鄉移民者遷移後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愈多，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根據文獻探討，移民者可從社會網絡獲得求職訊息、工作機會、技能以及情感支持等社會資源，有助於在城市立足，進而提升社會階層，故本研究假其所建構的社會網絡若能接觸愈多社會資源，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假設三 (H3)：城鄉移民者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先前的文獻探討顯示，人力資本愈高者，不僅適應能力較高，也能取得收入較高及職業聲望較佳的工作，故本研究假設人力資本愈高的移民者，其社會階層愈能向上流動。

假設三-1：城鄉移民者遷移前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假設三-2：城鄉移民者遷移後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第三節、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1、城鄉移民者的社會網絡規模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可知 Bourdieu 認定社會網絡的規模是影響一個人社會資本多少的要素，其測量基準主要為其親友數、參與團體數。考量城鄉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特性，一來網絡成員多以親友為主，二來網絡成員的職業類別有限，故此變項不納入網絡成員的職業類別差異，僅討論網絡規模（遷移前在遷入地既已認識的人）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對此變項之操作型定義為：搬來新北市前，已經有多少認識的人（不限親人或朋友）住在新北市。

2、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

前述的社會網絡規模係調查人際關係網絡的成員數目，並未納入網絡成員的職業類別差異，林南（2007）認為，由於社會資本是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源之中，因此必須掌握兩個重點，一是其網絡，二是網絡所涵蓋的資源。綜合言之，此即係文獻探討中提及林南的「接觸的社會資本」之概念，個人社會資本的高低除與社會網絡規模大小有正向關係外，更與所接觸的對象（社經地位愈高者其社會資源愈多）所具有的社會資源多寡有關。

至於如何測量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林南（2001）提出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請受訪者針對問卷上的職業名稱圈選他們在求職時，所認識的人任職之職業，之後衡量當中的三個變項：（1）、有認識人任職的職業數（extensity of embedded resources）；（2）、認識人最高的職業地位（upper reachability）；（3）認識人最高職業地位與最低地位的差距（heterogeneity）。上述三項變項代表的意義為，其所認識的人有很高的職業地位，表示認識資源（財富、權力、聲望）很高的人，有助於提升其社會階層。至於其所認識的人含括愈多職業數、職業最高地位與最低地位的差距很大，代表可得到不同階層的人幫忙，同樣有助於提升自身的社會階層。

由於定位法牽涉到社會網絡成員的社會資源，故需以社會經濟地位指標作為參照。前面文獻探討曾提及多項國內外常用的社經指標量表，考量 Ganzeboom 與 Treiman 1996 年建立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 為常用的國際指標，故將作為本研究量表。

本研究據上設計問卷，衡量研究對象移入新北市後的 5 年內其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情況。至於，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將以「接觸的社會資本」的方法計算，根據定位法選出 22 種職業列入問卷，該方法係依據職業聲望分數的高低對人口普查職業名單進行排序分組，並從中選出人數最多的職業，最後分成 22 種職業。這 22 種職業依 Ganzeboom 與 Treiman (1996) 的社經地位分數如下：

	職業	國際職業社經地位指數(ISEI)
1.	護士	43
2.	作家	65
3.	農民	23
4.	律師	85
5.	中學老師	69
6.	褓母	25
7.	清潔工	16
8.	人事主管	69
9.	大公司行政助理	54
10.	美髮師	29
11.	會計	51
12.	警衛(保全人員)	40
13.	生產部門經理	67
14.	工廠作業員	31
15.	電腦程式設計師	71
16.	櫃檯接待	52
17.	立法委員	77
18.	計程車司機	30
19.	大學教授	77
20.	搬運工	30
21.	警察	50
22.	大企業老闆	70

3、城鄉移民者的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泛指勞工的技術與能力，可經由學校教育、在職訓練等來增加個人專業知識藉此提高生產力。其測量依據為教育程度、職業訓練、技能純熟度以及

證照等。本研究將參考邱惠玲等人根據 OECD 人力資本指標為基礎所建構的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表 2-3-2），其架構中所指的人力資本「存量構面」是某一時點個人之技術、知識與能力等為人力資本存量總額，與本研究擬測量遷移後的 5 年內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概念一致，故將參考「存量構面」作為測量指標。據上，實際用以測量人力資本指標的項目包括：

- (1) 教育程度？
- (2) 是否參加職業訓練？
- (3) 是否擁有證照？

有關人力資本方面的問卷設計，面向包括遷移前的教育程度、遷移後 5 年內的教育情況以及是否擁有職業證照，此外考量並非所有職業都有對應的證照，因此讓填答人自我評量遷移後 5 年內的技能是否提升，藉此擴大測量範圍（詳見附錄，14 至 19 題）。

4、社會流動的情形

本研究關切的是個人在遷移後的生命歷程中其社會階層是否變動，研究焦點為社會流動範疇的「代內流動」。再者，如文獻探討所述，個人的社會位置主要由職業及社會地位決定，故本研究以 Ganzeboom 與 Treiman 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SEI)，衡量研究對象移民當時及現今的社經地位，藉此檢視其社會流動係屬「向上流動」、「向下流動」或「不變」。

此部分的問卷設計，目的在於探測研究對象的社會流動情況，故以遷移後的第一份工作對比當前工作，藉職業變動衡量社會流動（詳見附錄，20 至 22 題）。此外，本研究並納入填答人自評其社經地位，探詢其主觀社會流動評價（詳見附錄，24、25 題）。

5、控制變項

學界普遍認為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尚有性別、遷移的年數等，上述因素固然對個人的社會流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本研究希望驗證個人的「能動性」

(agency)³是否適用於本研究對象，即行動者固然受結構限制，但行動者仍可不斷的再生產資源（社會網絡、人力資本），形成改變結構的可能。

第四節、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1、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自雲林縣移入新北市累計超過 10 年（包括 10 年）以上，且為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者。

2、資料來源

本研究透過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協助，調查符合上述條件的會員，並根據上述各變項的操作型定義，製訂問卷（附錄）衡量社會網絡規模、人力資本存量以及社會流動情況。

新北市雲林同會約有 4,000 名會員，分為 11 個分會。本研究針對新北市雲林同會的 11 個分會進行電話訪問，以便利抽樣方式，從每個分會各完成 20 個樣本，總共完成 220 個有效樣本，抽樣率為 5.5%（220 樣本數/4000 名會員）。

問卷設計 28 題，並分為四部分。第一部份（1 至 7 題）收集個人基本資料，內容包括填答人之性別、學歷、年齡、移入新北市之年分、原居住於雲林縣何一鄉鎮，以及遷移的因素。上開問題之目的除獲得資本資料外，主要用以判斷填答人是否符合樣本標準。第二部分（8 至 13 題）衡量社會網絡的建構情況。第三部分（14 至 19 題）測量人力資本存量。第四部分（20 至 28 題）係探測研究對象的社會流動情況，以及加入同鄉會之效用。

第五節、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利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資料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1、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³ 一切能使社會結果「有所不同」的人的行動，無論是集體的、結構的，以及個人的行動；因此紀登斯認為能動性作用等於權力（power）（David Jary & Julia Jary, 1999）。

敘述性統計分析用以描述樣本基本特性，包括個人基本資料中的性別、年齡、學歷、遷移年數、職業類別以及社會網絡發展模式，並以各相關變數分配及百分比分析，以了解各樣本的特色與分布情形。

2、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為驗證本研究假設是否成立，本研究擬建立迴歸模型，藉此檢驗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規模、人力資本存量對社會流動的影響程度及解釋能力。

分析步驟為：模式一先放入控制變項，驗證控制變項（性別、遷移年數）對於「客觀社會流動」及「主觀社會流動」的影響。模式二加入自變項（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於「客觀社會流動」及「主觀社會流動」的影響，藉以判斷控制變項以外，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仍有顯著之解釋力。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並利用 SPSS 統計軟體對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第三章之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並對研究結果提出說明。

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重點在於分析樣本背景特性；第二節為迴歸分析，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來檢驗相關的影響因素。

第一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有效樣本之個人屬性如表 4-1，概述如下：

1、性別：男性有 166 人，占有有效樣本之 75.5%；女性有 54 人，佔占有有效樣本之 24.5%。顯示新北市雲林同鄉主要以男性為主，可能是男性較為熱衷參加該類地緣性社團。另外，過去的研究中，亦顯示男性相較於女性更容易從遷移獲得報酬，因此男性的遷移機率較女性高，可能因而導致本研究男女樣本比例的不平衡。

2、年齡：51 歲至 60 歲有 104 人，佔有效樣本之 47.3%；其次是 41 歲至 50 歲有 60 人，佔有效樣本之 27.3%；61 歲以上有 54 人，佔有效樣本之 24.5%；31 歲至 40 歲只有 2 人，佔有效樣本之 9%；30 歲以下的人數為 0 人。顯示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的年齡較高，以中年以上者居多。

3、教育程度：國中有 68 人，佔有效樣本之 30.9%；其次是高中職有 66 人，佔有效樣本之 30%；再其次是國小（含以下）有 60 人，佔有效樣本之 27.3%；專科 14 人，佔有效樣本之 6.4%；大學 8 人，佔有效樣本之 3.6%；研究所（含以上）4 人，佔有效樣本之 1.8%。

4、遷移年數：遷移年數 31 年以上者有 78 人，佔有效樣本之 35.5%；26 年至 30 年有 63 人，佔有效樣本之 28.6%；16 年至 20 年有 46 人，佔有效樣本之 20.9%；21 年至 25 年有 20 人，佔有效樣本之 9.1%。顯示新市雲林同鄉會員大多為遷移 20 年以上的城鄉移民者。

5、入會年數：6 年至 10 年有 113 人，佔有效樣本之 51.4%；其次是 5 年以

內，佔有效樣本之 24.5%；再者是 16 年至 20 年有 25 人，佔有效樣本之 10.5%。

6、原居住鄉鎮：虎尾鎮 19 人，佔有效樣本之 8.6%；元長鄉 18 人，佔有效樣本之 8.2%；台西鄉及四湖鄉均為 17 人，各佔有效樣本之 7.7%。

表 4-1 個人屬性

樣本屬性	類別	人／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6	75.5%
	女	54	24.5%
年齡	30 歲以下	0	0%
	31 歲至 40 歲	2	9%
	41 歲至 50 歲	60	27.3%
	51 歲至 60 歲	104	47.3%
	61 歲以上	54	24.5%
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	60	27.3%
	國中	68	30.9%
	高中職	66	30%
	專科	14	6.4%
	大學	8	3.6%
	研究所（含以上）	4	1.8%
遷移年數	10 年至 15 年	13	5.9%
	16 年至 20 年	46	20.9%
	21 年至 25 年	20	9.1%
	26 年至 30 年	63	28.6%
	31 年以上	78	35.5%
入會年數	5 年以內	54	24.5%
	6 年至 10 年	113	51.4%

	11 年至 15 年	23	10.5%
	16 年至 20 年	25	11.4%
	21 年以上	4	1.8%
	未回答	1	0.5%
原居住鄉鎮	二崙鄉	11	5.0%
	口湖鄉	12	5.5%
	土庫鄉	1	.5%
	土庫鎮	10	4.5%
	大埤鄉	10	4.5%
	元長鄉	18	8.2%
	斗六市	10	4.5%
	斗南鎮	13	5.9%
	水林鄉	11	5.0%
	北港鎮	12	5.5%
	古坑鄉	4	1.8%
	台西鄉	17	7.7%
	四湖鄉	17	7.7%
	西螺鎮	14	6.4%
	東勢鄉	8	3.6%
	林內鄉	6	2.7%
	虎尾鎮	19	8.6%
	崙背鄉	4	1.8%
	麥寮鄉	8	3.6%
	莿桐鄉	5	2.3%
褒忠鄉	7	3.2%	

	未回答	3	1.4%
--	-----	---	------

另外，本研究之自變項及依變項的樣本特性如表 4-2。其中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係依照林南「定位法」依據有認識人任職（職業數）、認識人最高的社經地位 ISEI，以及認識人最高社經地位 ISEI 與最低社經地位 ISEI 的差距，再對這三個變項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由於 KMO 與 Bartlett 檢定達 .695** 結果顯著，因此將此一萃取出的因素值作為「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平均數為 38.0439，標準差為 18.5209。

再者，「客觀社會流動」的衡量，則依據受測者現在工作的 ISEI 減去遷移後第一個工作的 ISEI。至於，「主觀社會流動」的衡量，則根據受測者自評現在的社會地位與剛遷移時之比較，以及自評現在的經濟情況與剛遷移時之比較，由於上述兩變項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因此依據兩者的算數平均數建構「主觀社會流動」，平均數為 3.4110，標準差 0.9323。

表 4-2 自變項及依變項之描述分析

樣本屬性	類別	人/次數	百分比
社會網絡規模（遷移前在遷入地所認識的人數）	10 人以內	156	70.9%
	11 人至 20 人	31	14.1%
	21 人至 30 人	9	4.1%
	31 人至 40 人	5	2.3%
	40 人以上	19	8.6%
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因素值）	0	30	14.2%
	1 至 10	0	0%
	11 至 20	9	4.2%
	21 至 30	13	6.1%

	31 至 40	30	14.2%	
	41 至 50	66	31.1%	
	51 以上	64	30.2%	
	平均數		標準差	
	38.0439		18.5209	
遷移時的受教年數	6 年	66	30%	
	9 年	78	35.5%	
	12 年	62	28.2%	
	14 年	10	4.5%	
	16 年	4	1.8%	
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	有	40	18.2%	
	無	180	81.8%	
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	有	33	15%	
	無	187	85%	
遷移當時有無考取證照	有	10	4.6%	
	無	209	95.4%	
遷移後 5 年內有無考取證照	有	33	15%	
	無	187	85%	
遷移後 5 年內在職場有無學到新技術	有	98	45.2%	
	無	119	54.8%	
客觀社會流動	0 以下	9	4.5%	
	0	97	48.5%	
	1 至 10	14	7%	

	11至20	20	10%
	21至30	10	5%
	31至40	25	12.5%
	41至50	24	12%
	51以上	1	0.5%
自評現在的社會地位比剛遷移時	高很多	41	18.7%
	高一些	64	29.2%
	沒變化	92	42%
	低一些	18	8.2%
	低很多	4	1.8%
自評現在的經濟情況比剛遷移時	好很多	31	14.1%
	好一些	73	33.2%
	沒變化	56	25.5%
	差一些	44	20%
	差很多	16	7.3%
主觀社會流動	1	3	1.4%
	1.5	3	1.4%
	2	19	8.7%
	2.5	22	10%
	3	55	25.1%
	3.5	41	18.7%
	4	32	14.6%

	4.5	20	9.1%
	5	24	11%
	平均數		標準差
	3.4110		0.9323

第二節、迴歸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以多元階層迴歸分析來檢驗影響因素：首先放入控制變項，驗證控制變項對於社會流動的影響。接續再分別針對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自變項對社會流動進行迴歸分析。

本研究設立下列迴歸模型：

模型一：先放入控制變項（性別、遷移年數），驗證控制變項對於「客觀的社會流動」及「主觀社會流動」的影響。

模型二：除了模型一之控制變項外，另加入自變項（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於「客觀社會流動」及「主觀的社會流動」的影響，藉以瞭解控制變項之外，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有顯著的解釋力。

以上各模型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3、表 4-4。說明如下：

1、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客觀社會流動」的影響（表 4-3）：

模型一只放入受測者的性別及遷移年數作為控制變項。其迴歸分析結果（表 4-3），模型一之 R^2 為 0.061，總解釋變異量為 6.1%，F 值為 6.262 ($p=0.002 \leq 0.01$)，因此性別與遷移年數對「客觀社會流動」之解釋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性別與遷移年數對「客觀社會流動」有顯著的解釋力。

在控制變項中，「性別」的估計係數為 10.534 ($p=0.001 \leq 0.01$)，表示性別對「客觀社會流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意即男性的「客觀社會流動」情況比女性

的「客觀社會流動」更佳，也就是男性比起女性更容易達成向上的「客觀社會流動」。至於遷移年數，其估計係數為 0.046 ($p=0.727>0.05$)，雖然遷移年數對「客觀社會流動」有正向影響，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模型二除性別與遷移年數外，另外投入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遷移時的受教年數、遷移當時有無考取證照、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遷移後 5 年內有無考取證照、遷移後 5 年內在職場有無學到新技術等自變項，由表 4-3 可知，模式二的 R^2 為 0.103，可解釋對「客觀社會流動」變異的 10.3%， F 為 2.135 ($p=0.024<0.05$)，而 $\Delta R^2=0.043$ ，表示增加這些變數之後，模型解釋力增加 4.3%，但 $\Delta F=1.096$ ， $\Delta p=0.368>0.05$ ，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在控制性別與遷移年數以及投入上述變項後，並無法提升模型的解釋力。

據上，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1、假設三-2 對「客觀的社會流動」均不成立。

2、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主觀社會流動」的影響（表 4-4）：

首先，本研究針對受訪者自評現在與遷移時的社會地位及經濟狀況，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 α 係數為 0.724，顯示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故依據上述兩變項建構新變項「主觀的社會流動」。

再來，模型一放入受測者的性別及遷移年數作為控制變項。其迴歸分析結果（表 4-4），模型一之 R^2 為 0.027，總解釋變異量為 2.7%， F 值為 2.993 ($p=0.052>0.05$)，因此性別與遷移年數對「主觀社會流動」的解釋力，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性別與遷移年數對「主觀社會流動」無顯著的解釋力。其中，「性別」的估計係數為 0.250 ($p=0.089>0.05$)，「遷移年數」的估計係數為 0.012 ($p=0.081>0.05$)，均未具統計意義。

模型二在性別與遷移年數之外，另投入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遷移時的受教年數、遷移當時有無考取證照、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遷移後 5 年內有無考取證照、遷移後 5 年內在職場有無學到新技術等自變項，由表 4-3 可知，模式二對依變項的解釋力達到 R^2 為 0.133，可解釋對「客觀社會流動」13.3%的變異量， F 為 3.132 ($p=0.001 < 0.01$)，而 $\Delta R^2=0.106$ ，表示增加這些變數之後，模型解釋力增加 10.6%，且 $\Delta F=3.107$ ， $\Delta p=0.002 < 0.05$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在控制性別與遷移年數以及投入上述變項後，模型的解釋力有顯著的提升。

另外，控制「性別」與「遷移年數」後，模型二中作為控制變項的「遷移年數」之估計係數增至 0.016 ($p=0.026 \leq 0.05$)，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同時，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遷移後 5 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遷移時的受教年數對「主觀社會流動」，其估計係數分別為 -0.003 ($p=0.047 < 0.05$)、 0.007 ($p=0.044 < 0.05$)、 0.07 ($p=0.007 < 0.01$)，均達顯著水準，其中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對「主觀社會流動」有負向影響。因此，假設二、以遷移時的受教年數作為自變項的假設三-1 成立。假設 1、假設三-2 不成立。

表 4-3 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客觀社會流動」的影響

依變項-客觀社會流動				
	模式一		模式二	
變項名稱	估計係數	標準差	估計係數	標準差
常數項	3.081	4.657	7.535	7.361
控制變項				
性別	10.534**	2.996**	11.012**	3.109**
遷移年數	.046	.132	-.016	.141
自變項				
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			.017	.032
遷移後5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			.022	.073
遷移時的受教年數			-.673	.511
遷移當時有無考取證照			-3.242	6.016
遷移後5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			3.975	3.234
遷移後5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			4.481	3.927
遷移後5年內有無考取證照			3.491	4.057
遷移後5年內在職場有無學到新技術			.843	2.723
R^2	.061**		.103	
F	6.262**		2.135*	
ΔR^2	.061**		.043	
ΔF	6.262**		1.096	

表 4-4 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本對「主觀社會流動」的影響

依變項-主觀社會流動				
	模式一		模式二	
變項名稱	估計係數	標準差	估計係數	標準差
常數項	2.876**	.239**	1.797**	.366**
控制變項				
性別	.250	.146	.200	.146
遷移年數	.012	.007	.016*	.007*
自變項				
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			-.003*	.002*
遷移後5年內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			.007*	.004*
遷移時的受教年數			.070**	.026**
遷移當時有無考取證照			-.415	.309
遷移後5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			.183	.163
遷移後5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			-.077	.192
遷移後5年內有無考取證照			.255	.199
遷移後5年內在職場有無學到新技術			.177	.134
R^2	.027		.133**	
F	2.993		3.132**	
ΔR^2	.027		.106**	
ΔF	2.993		3.107**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檢驗「社會網絡」及「人力資本」對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員在社會流動面上的影響，研究方法設定社會網絡的衡量指標（認識的人數、林南定位法），人力資本則參考邱惠玲等人根據 OECD 人力資本指標為基礎所建構的我國人力資本統計指標架構（原教育年數、職業訓練、證照、技能），最後分別根據 Ganzeboom 與 Treiman(1996)建構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SEI) 以及自我對社經地位的評價，藉以作為「客觀社會流動」及「主觀社會流動」的依據。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城鄉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社會網絡規模對「客觀社會流動」無顯著的影響，但對「主觀的社會流動」卻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根據文獻，移民者遷移前在遷入地若已有親友，將有利於其應遷移後的環境、謀職、創業。本研究發現 127 位遷移前在遷入地已有親友的受訪者中，有 55 人接受過遷入地親友介紹工作、有 34 人接受過遷入地親友提供住處、9 人接受過遷入地親友金錢協助、52 人接受過遷入地親友提供安慰與鼓勵。縱使有以上的協助，研究結果卻顯示對研究對象的「客觀社會流動」無影響，對「主觀社會流動」則有負向影響。其原因可能是遷移前在遷入地既有的親友，一方面是資源來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遷移者的負擔，比如，遷移者在親友有急難時須伸出援手，其在遷入地親友數愈多，愈可能出現親友需要協助的機會。

另外的原因可能是這些遷移前在遷入地既已認識的人大多屬「強連結」性質的親友，而城鄉移民者遷入城市後反而較能建立「弱連結」性質的新社會網絡，先前的文獻即發現透過「強連結」謀職的人其薪資報酬率及職業社經地位均不如透過「弱連結」謀職者。因此，單從社會網絡規模（量）的面向，尚無法說明此一研究結果，仍須進一步探詢社會網絡「質」（強弱連結）的差異，才能找到影響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

2、城鄉移民者遷移後建構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對「客觀社會流動」無

顯著影響，對「主觀的社會流動」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文獻探討，社會網絡蘊藏求職訊息、工作機會、技能以及情感支持等社會資源，簡言之，人脈愈廣闊愈能從社會網絡獲得愈多的社會資源，愈有助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然而根據本研發現以林南「定位法」所測量出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對「客觀社會流動」無顯著影響，但對「主觀的社會流動」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為「客觀社會流動」採用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ISEI)係以職業論定社經地位，然而本研究對象以 ISEI 測量發現有 97 位受訪者因遷移當時的第一份工作和現在的工作相同，因而呈現社會流動值為 0 的情況。然而，實際上即使工作未曾改變，不代表個人的社經地位亦為不變，因為某人即使始終從事同一個工作，但薪水可能會大幅增加，或晉升為資深員工（比如工具機操作工，即所謂的黑手，以熟練度及是否可操作電腦輔助設備區分，平均薪水可達 2 至 3 倍的差別）。這些變化無法從 ISEI 中測出，但藉由受訪者自評「主觀的社會流動」，則能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

3、城鄉移民者遷移前累積的人力資本（遷移時的受教育年數），對「客觀社會流動」無顯著影響，但對「主觀的社會流動」有顯著正向影響。

多數文獻顯示，教育對社會流動有正向影響，然而在本研究中發現遷移時的受教育年數對「客觀社會流動」的影響不顯著，對「主觀的社會流動」則有顯著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是受限於 ISEI 量表係依職業評定社經分數，無法在受訪者前後從事同一工作的情況下測出其社經地位實際上的改變，藉由「主觀的社會流動」反而可顯現出社經地位的變化。

4、城鄉移民者遷移後所累積的人力資本愈高，無論對「客觀社會流動」、「主觀的社會流動」皆無顯著影響。

本研究發現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正規教育、遷移後 5 年內有無接受職業訓練、遷移後 5 年內有無考取證照，以及遷移後 5 年內在職場所有無學習技術，均對主客觀的社會流動無顯著影響。其原因可能是進入職場後，除人力資本之外，

尚有人際關係、情緒管理、應變能力等因素影響其職場表現，而職場表現的優劣進而影響社會流動的情況。這些潛在因素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不顯著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政府應對偏鄉及弱勢家庭投入更多教育資源

本研究發現遷移前的教育年數對「主觀的社會流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移民者遷移前的教育程度愈高，其後來的社會流動表現愈佳。基此，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將教育視為促進正向社會流動的投資，尤其對於類似雲林縣等經濟條件較差、人口外流嚴重的縣市，更應挹注教育資源，提升偏鄉教育水準。此外，針對弱勢家庭的孩子，政府更應提供充足的福利措施（如減免學費、獎助學金、生活津貼）鼓勵其升學，避免弱勢學生因經濟壓力而輟學或過早進入職場，因為在教育存量不足的情況下進入職場，縱使可立即為個人、家庭帶來經濟收入，但其未來的社會流動甚難向上，且可能每下愈況，如此不僅阻礙個人及其家庭的發展，亦將限縮社會的流動性，讓社會階層愈加僵化。

2、城鄉移民者可多參與社團或公共事務藉以擴展社會網絡

本研究發現以林南「定位法」測量出的社會網絡所接觸的社會資源對「主觀的社會流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驗證「出外靠朋友」一說。過去的文獻其實已發現社會網絡即是社會資源的貯藏所，相對於人力資本可藉由教育途徑獲得，社會網絡則必須依靠人際關係的開拓與經營。然而，經由教育累積的人力資本，通常有其極限，一般人在接受一定年數的學校教育後便甚少進修，社會網絡則可較不受限制的拓展，隨著社會網絡的開展，社會資源愈加豐富。

因此，本研究建議城鄉移民者可廣泛參與社團或投入公共事務，比如同鄉會、商會、工會、才藝社或志工等團體，藉以擴增社會網絡，從中可獲得情感支持、謀職訊息、就業機會等社會資源，這些資源將有助個人的社會流動。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1) 抽樣方式：

本研究受限於未能取得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所有會員名單，因此無法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電話訪問，僅能針對新北市雲林同鄉會 11 個分會所提供的名單，以便利抽樣方式，從 11 個分會各完成 20 個樣本數。然而，新北市雲林同鄉會 11 個分會的會員人數不一，且以便利抽樣，都會影響對母體的推估。再者

(2) 受測者的記憶可能失真：

本研究對象限定為遷移 10 年以上者，樣本平均遷移年數則為 29.28 年，且因研究設計係調查遷移前的社會網絡規模、遷移後的 5 年內所認識的人數及其職業類別，難免因時日已久，導致受測者有時僅能約略回答當時認識的人數以及所認識的人其從事的職業類別。上述調查受限於受測者的記憶，勢必對研究結果有所影響。

2、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 增加樣本數

本研究受限於無法取得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所有會員名冊，且在人力及時間限制下，僅能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電話訪問，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擴大樣本數，以期更加如實掌握母體的特性。

(2) 增加對「代間流動」的研究

本研究聚焦在個人遷移後其生命歷程中社會階層是否變動，屬於社會流動範疇的「代內流動」。由於社會流動亦可經由比較上下兩個世代的社會階層變化，評斷其社會流動情況，即「代間流動」。藉由對「代間流動」的研究，不僅可觀察世代階層情況的變化，也可進而比較「代間流動」與「代內流動」的幅度，以及影響兩者的因素，如此將可增加社會流動研究的豐富性。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于若蓉 (2009)。社會網絡與勞動市場表現：台灣資料的分析。台灣社會學，18，95-137。
- 王春 (2007)。人力資本的獲得與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流動——一種立足於制度視角的分析。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7卷第5期。
- 王德睦、陳宇嘉、張維安 (1986)。教育結構變遷與教育機會均等。載於瞿海源、章英華 (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王效仿 (2000)。大學生同鄉會的社會學思考。武漢教育學報，2。
- 王奮宇、趙延東 (2002)。城鄉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獲得及決定因素。中國人口科學，4。
- 王奮宇、趙延東 (2003)。流動民工的經濟地位獲得及決定因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何友暉、廖正宏 (1969)。今日中國社會職業等級評價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5，151-154。
- 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1992)。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第一卷。台北：行政院戶口普查處。
- 李效玲 (1979)。民間社團之研究——以台北地區同鄉組織為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培林 (1996)。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4。
- 李明 (譯) (1990)。社會不平等——社會階層化與流動 (原作者：Judah Matras)。台北，桂冠。
- 李春玲 (2007)。城鄉移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獲得。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7卷第4期。
- 李漢林 (2003)。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

邱惠玲、王玉珍、蔡惠華、馬辰明、鄭萬助 (2006)。建立人力資本統計之研究。

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林季平 (2005)。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1980—2000。台灣社會學期刊，34。

林宗弘 (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

台灣社會學刊，43。

林南 (2007)。社會資本理論與研究簡介。社會科學論叢，第1卷第1期。

姚先國、俞玲 (2006)。農民工職業分層與人力資本約束。浙江大學學報，5。

洪嘉瑜、陶宏麟、蔡智發 (2003)。影響台灣內部遷徙的經濟因素探討。經濟論文叢刊，31卷2期。

周業謙、周光淦 (譯) (1999)。大學辭典系列——社會學辭典 (原作者：David Jary、Julia Jary)。台北：城邦。

紀樹立編 (譯) (1987)。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北京：三聯書店。

曹子璋 (2003)。農民工的再建構社會網絡與網內資源流向。社會學研究，3。

曹茂森、康維波 (2001)。關於大學生同鄉會的分析與對策。山東省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3。

姜繼紅 (2005)。社會資本與就業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高永光 (2005)。台北縣彰、雲、嘉、南同鄉會選舉動員之分析——2005年縣長選舉個案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夏鑄九 (1995)。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2。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張茂桂 (1984)。主觀生活品質與社會階級。載於楊國樞、瞿海源 (主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峰彬(1993)。社會地位取得：城鄉之比較。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碩士論文。
- 張鳳林(2006)。人力資本理論及其應用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許嘉猷(1986)。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台北：三民書局。
- 曾旭正(1993)。台北人的形成——台北縣市外來人口的遷移過程與都市經驗。載於蕭新煌(主編)，台北縣移入人口之研究。台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
- 曾淑芬(2001)。技能與社會階層流動之初探。資訊社會研究，1。
- 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社會資本(原作者：David Halpern)。台北：巨流。
- 黃毅志(1998)。台灣地區新職業分類的建構與評估。調查研究，5。
- 黃毅志(2001)。台灣地區勞力市場分隔之探討：流動表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
- 黃毅志(2003)。「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師大教育研究集刊，49(4)。
- 黃敏星(2003)。百年台灣人口重心之變遷：1897—2008。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鄧方(譯)(1992)。社會理論的基礎(原作者：James Coleman)。社會科學出版社。
- 廖正宏(1984)。人口遷移。台北：三民。
- 蔡芬芬(2007)。求職歷程中之人力資源及社會網絡與就業表現之分析。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社會科學學報，15。
- 蔡淑鈴、瞿海源(1989)。主客觀職業量表之初步建構。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蔡瑞明(1997)。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與社會流動。載於張芷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蔡瑞明、葉秀珍(2011)。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台北：聯經。
- 賴威岑(2002)。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心理幸福特質之探討—與其他職業做比較。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旭暉(2004)。非正式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研究——以成都市進城農民工為個

案。中國農村經濟，3。

鄭為元 (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

蕭新煌 (1993)。台北縣移入人口之研究。台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

謝高橋、張清富 (1997)。城鄉連結——遷移人口的特性與適應。載於蔡勇美、章英華 (主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

謝高橋 (1985)。都市人口遷移與社會適應——高雄市個案研究。台北：巨流。

謝國雄 (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第2期。

二、外文部分

Aldridge, S. (2001). Social mobility.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 www.number-10.gov.uk.

Aguilera, Michael B. (2003). The Impact of the Worker: How So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Influence the Job Tenure of Formerly Undocumented Mexican Immigra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73, 52-83.

Bilton, Tony, Kevin, Bonnett, Philip Jones, Ken Sheard, Michelle Stanworth and Andrew Webster. (1987), *Introductory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 G.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241-258.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by, L. T. (2001) The boundaryless career experiences of mobile spouses in dual-earner marriages. *Group and Organisational Management*, 26(3):343-68.

Flap, H. (1989) Social Capital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A Re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Research Committee 28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Utrecht April.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80.

Ganzeboom, Harry B. 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01-239.

House, J.S, Umberson, D. & Landis, K.R. (1988).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social suppor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293-318.

Korpi, T., (2001), Good friends in Bad Times? Social networks and Job Search among the Unemployed in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44, 157-170.

Lin, Na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1981a).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393-405.

Lin, Nan, John C. Vaughn, and Walter M. Ensel. (1981b) . Social Resources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Forces* 59: 1163-1181.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M. (1991). *Against Unemployment*.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附錄

訪員_____區_____號 NO. _____

您好：

這裡是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學生，我們正在針對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進行一項學術研究，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全部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不對外公開，請您放心作答。

指導教授：辛炳隆博士 研究生：陳其育 敬上

1. 請問您加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已經幾年？_____年(我們以新北市雲林同鄉會會員為研究對象，如果您沒有參加新北市雲林同鄉會，下次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2. 請問您搬來新北市已經幾年？_____ (無論您是否曾經搬到新北市以外的縣市，只要累計在新北市住滿10年，您就是本研究的對象。如果您在新北市累計居住不滿10年，下次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3. 您原本住在雲林縣的那一個鄉鎮市？(請打勾) 斗六市、斗南鎮、西螺鎮、虎尾鎮、土庫鎮、北港鎮、莿桐鄉、林內鄉、古坑鄉、大埤鄉、崙背鄉、二崙鄉、麥寮鄉、台西鄉、東勢鄉、褒忠鄉、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元長鄉
4. 您的最高學歷是：(1) 研究所(含以上) (2) 大學 (3) 專科
(4) 高中職 (5) 國中 (6) 國小(含以下)
5. 您的年齡是：_____歲
6. 您的性別？(1) 男 (2) 女
7. 您是因為什麼因素搬來新北市？(可複選)
(1) 求學
(2) 找工作
(3) 創業

(4) 結婚

(5) 其他_____ (請說明)

8. 在您從雲林縣搬來新北市之前，是否已經有認識的人住在新北市？

(1) 有_____人數 (請續問第 9 題)

(2) 沒有 (請直接問第 10 題)

9. 上一題提及到 (您所認識) 的人，在您搬來新北市之後，提供過您那些協助？
(可複選)

(1) 提供工作 (包括介紹工作)

(2) 提供住處

(3) 提供金錢協助

(4) 提供安慰與鼓勵

(5) 以上皆無

10.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是否曾有親人 (直系及非直系) 住在新北市？

(1) 有_____人

(2) 沒有

11.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是否曾有朋友住在新北市？

(1) 有_____人

(2) 沒有

12.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參加過那些社團 (如獅子會、扶輪社、商會、工會、
廟寺管理委員會等) ？

(1) 有_____社團 (請填社團名稱)

(2) 沒有

13. 以下是常見的職業，請問您搬來新北市的5年內所認識的人（不限親人、朋友，也不限定住在新北市）有無從事以下的職業？

1.	護士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2.	作家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3.	農民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4.	律師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5.	中學老師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6.	褓母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7.	清潔工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8.	人事主管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9.	大公司行政助理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0.	美髮師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1.	會計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2.	警衛（保全人員）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3.	生產部門經理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4.	工廠作業員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5.	電腦程式設計師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6.	櫃檯接待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7.	立法委員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8.	計程車司機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9.	大學教授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20.	搬運工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21.	警察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22.	大企業老闆	<input type="checkbox"/> 有	<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

14. 您剛搬來新北市當時的教育程度？（1）研究所（含以上） （2）大學
（3）專科 （4）高中職 （5）國中 （6）國小（含以下）

15.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5年內有無繼續接受正規教育？

（1）有_____（請填學校名稱）

（2）沒有

16.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有無參加過 24 小時以上的職業技能訓練？

(1) 有

(2) 沒有

17. 您搬來新北市前是否已經有技能檢定證照？

(1) 有

(2) 沒有

18.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是否有考取技能檢定證照？

(1) 有

(2) 沒有

19. 您搬來新北市後的 5 年內在工作中有沒有學到新的技術？

(1) 有

(2) 沒有

20. 您離開雲林縣前所從事的職業？_____

(請填職業)

21. 您搬來新北市時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_____

(請填職業)

22. 您目前是否有工作（若已退休，請答退休時的職業）？

(1) 有_____ (請填職業)

(2) 沒有

23. 您目前任職的工作已經做多久了（若已退休，問最後一個工作做幾年）？__
年

24. 您自認現在的社會地位比剛搬來新北市時



(1) 高很多

(2) 高一些

(3) 沒變化

(4) 低一些

(5) 低很多

25. 您自認現在的經濟情況比剛搬來新北市時

(1) 好很多

(2) 好一些

(3) 沒變化

(4) 差一些

(5) 差很多

26. 您自認從搬來新北市到現在，您的職業歷程變化情況？

(1) 愈來愈好

(2) 上上下下

(3) 沒有改變

(4) 愈來愈差

27. 假如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分成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低層和底層階級，您認為您屬於那個階級？

(1) 上層

(2) 中上層

(3) 中層

(4) 中低層



(5) 底層

28. 整體而言，加入雲林同鄉會對您有那些幫助？（可複選）

(1) 認識更多朋友

(2) 對生意、工作有幫助

(3) 增加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4) 聯絡感情

(5) 沒有幫助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謝謝。

